

编者按:《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是由近代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第一份英文月刊,创办于1832年5月,停办于1851年12月,一共出版20卷,232期。《中国丛报》的出版,正处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前后的20年,该刊主要面向西方社会公众详细记录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具有特别重要的汉学文献价值。该刊前两卷并无有关中国语言文字的论述,到第三卷(1834年5月)才第一次发表了有关中国语言的一篇长篇文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语言的原始性、广泛性和各种方言的特点和价值,以及欧美人对中国语言的学习和研究的历史,并且论及西方人学习汉语的必要性。站在国际汉语教育与汉语国际传播的视角,早期汉学英文期刊中的许多有关汉语的文章对了解西方汉学界汉语知识体系的建构以及对汉语特点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已发表的一些论著对此偶有涉及,间有引用。本刊特此约请厦门大学方环海教授的课题组将有关论文译出,以饕学界。本刊也特别欢迎学界同仁惠赐有关译文稿件。

中国语言的特点及其价值

闻雨轩 夏长洪 译注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中国 厦门 361102)

中图分类号:H0-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221-9056(2017)06-0848-09

DOI 编码:10.14095/j.cnki.oce.2017.06.014

一、汉语的特性

(一)汉语的原始性

原始性是汉语一大特点。汉语的起源,如同华夏先民,都消失在早期的洪荒时代。汉语就其形式和结构而言,与世界上其他语言并无多少相似及相关之处,绝对无可比拟。希伯来语仅存于《圣经》的神谕中,它早已不再是一种口语。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语言在书面语中几近完美,然而其流传至今,使用者的口语已经和本初的书面语大相径庭。梵文,虽然作为一个民族的语言,也依然难逃此劫,而阿拉伯语一直无足轻重,直到穆罕默德运用武力侵略将其带出阿拉伯^[1]。要论世界上语言的古老性,除了希伯来语,汉语恐怕无与伦比。在人类语言分化时期,汉语好像突然出现,然后与人类其他语言分道扬镳,独立发展。随着时间流逝,时代更迭,世界日新月异,新的族群不断出现,

收稿日期:2015-08-01

作者简介:闻雨轩,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教育。Email: 582290155@qq.com

夏长洪,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教育。Email: 1762045616@qq.com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世纪稀见英文期刊与汉语域外传播研究”(15BYY05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7-19世纪欧洲汉学视野中的汉语类型特征研究”(13YJZH021)、福建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8-19世纪西方汉学与汉语词类研究”(2012B149)、厦门大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启动项目“欧洲的汉语传播与华文跨境教育研究”(HGF04)、厦门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项课题的阶段性成果。方环海为本文的通讯作者。

新的语言也不断产生,然而在这些变化中,汉语言却变化甚微。自从我们认识汉语开始,其书面语几乎保持不变,与今日中国这个大帝国的日常用语相比,早期汉语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二)汉语的广泛性

如果审视一下汉语使用的广泛性,我们就能正确认识汉语的本质及其重要性。汉语不仅为中国这个大帝国的3.6亿人使用,并且在邻国和藩属国也得到广泛使用,成为当地的官方语言。比如,在琉球许多人可以熟练地读写汉语;在朝鲜,很多人研习中国经典以模仿天朝人民的举止、风俗、法制为自豪,这对朝鲜民族性格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在其国家文件、书籍以及上流社会的通信中,均使用汉语;在东京和越南南部地区,汉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运用,在那里,无论哪个阶层,学会汉语是必不可少的,似乎汉语成了部分地区唯一的交际语言;在柬埔寨、泰国、老挝及印度群岛的诸岛上,有数以千计的原住民,主要是中国移民,说着同样的语言。根据我们的调查,包括所有这些国家的人民在内,比较保守的估计,说汉语的人约为四亿,说汉语的国家数比欧洲国家的总和还要多。

(三)汉语官话的稳定性与方言的多样性

汉语的使用历史悠久,分布地域很广,其自身肯定会发生变化,而且就目前来看不同地方的汉语也很不相同,对此具体情形将在我们的另一篇论文中进行说明,在文中我们将论证汉语的演进过程,并展示其古今形式变化的一些语例。汉语在初期和早期经历了很多变化,特别是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汉语的发音差异很大。尽管中国境内有官方的标准,但仍存在大量的方言,并各有其影响范围。不过,这些为人们所使用的方言,被限制在一定的比较狭窄的范围以内,并且对汉语本体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从这两个事实可见,如果我们了解中国历史及其教育系统,那么汉语主体的持久稳定性与方言的多样性就很容易理解。一方面,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经常分裂成许多小国,互相敌对,离得较远的小国无法进行自由交流,在这些地方出现并建立方言,因此形成了多种方言。另一方面,中国渴望入仕为官者需熟读经典,并且掌握一些在朝廷和各级官府文书中盛行的文体和语音知识,因此官话比较稳定与持久。造成汉语方言差异如此之大、数量如此之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汉语本身缺乏字母系统支撑,因此无法根据其方块字的书写判断其读音。外国的某种方法,如印度佛教徒所用两个已知汉字来展示第三个汉字读音^[2],中国人几乎是不用的,每个小孩以及所有那些在汉语学习中取得很大进步的人,他们的汉字发音也大多是从教书先生那学来的。

我们所讲的中国方言之间的差异不同于印度语言之间的差异。在某些情况下,方言不同于中国通用的官方语言,但是一般差异并不大。需要注意的是,对中国方言之间的差异,主要关注其发音方面的差异,还有的差异则是由于对字的选择和句子结构造成的。诚然,在许多情况下,一种方言的特征在于其发音,而在中国北方,纯粹中国人广泛使用的通常称为官话,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地方就不存在本地方言,比如在北方的中蒙边界,鞑靼人的语言由于满人的统治而发生的变化是很明显的。由此可知,在中国的边界地区,类似的语言影响必将时有发生,比如在江南地区,当地方言和官话差异明显;福建和其东部地区,其方言和官话的差异更是惊人,只学习过官话的人,是不能理解福建方言的;中国西南部的语言与官话偏离度较小,这些地方的城市方言与中国官方通用语言相似,一个懂官话的人只要稍加注意谈话的话题就可以理解所说的内容;在越南、朝鲜、日本等用汉字的地方,其方言与官话的差异甚至比福建方言与中国官话的差异还大。

二、西方人对汉语特点的初步认识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汉语和汉字被如此多的人口使用,分布地域如此之广,这一定会吸引有进取心之人的注意。迄今外国人忽视汉语太久了,即使从商业角度来看,也会觉得汉语太难学,或者

觉得汉语根本没有学习的价值,不过中国人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在一些现代人看来,汉语与古希腊古罗马的语言一样,极具优越性。在他们眼里,汉语优美而出色,既可以传递知识,又包含智慧,完全掌握好这门语言就可以通向荣耀、财富和权力的康庄大道,因此,他们孜孜不倦地学习汉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中国人而言,外国人的语言仅仅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术语,不值得注意。中国人的礼仪和管理治国的准则都在他们的语言中,其中,早期许多智者的革新学说从遥远的古代一直流传下来,又必将传给将来的一代,谁拒绝学习,谁对汉语不敬,谁就会被认为是不学无术,甚至是未开化的、粗鲁的和野蛮的。或许我们会对这种民族的过于自负付之一笑,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由于汉语的久远性和应用的广泛性,它必将会引起我们的强烈关注,并且如果考虑到这种语言含有丰富的古代史实,它将会更有价值。更何况,如果仔细考虑一下,汉语作为一种有趣的交流思想的工具,能够开启广阔且未触及领域内的哲学研究,对于那些研究和熟悉的人而言,汉语绝对值得关注,也必将有所回报。为给读者说明汉语,我们并不关注汉语的特质,无论其怎样新颖或者引人注目,以至于忽略其缺点,也不会不留意其优点,以至于贬低其合法的外在形式。

(一) 汉语语言系统的缺陷

1. 汉字方面

我们已经列举了汉语的几大特点,这些特点把汉语从世界其他语言和方言区别开来。我们提到汉语方块字的形成,其并非由字母构成,而是由不表音的简单线条构成。一个习惯于使用西方字母语言的人几乎不可能构想、不可能运用汉字来表意,也不会想象到中国人有如此的聪明才智来创造这个文字系统,构建与新事物和想法相对应的汉字或符号。就这种文字当前的形式看,其绝非象形文字,因此我们拿汉字和埃及文字、墨西哥文字做比较也是徒劳的。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在这些系统中发现能使我们断定它们由相同原理构成的相似的标记。

汉字的构成将笔划降低到七划或者八划,它们构成的基本汉字仅有 214 个。在这 214 个基本的汉字中不少还是由最初级的汉字构成,这并不是严格的哲学意义上的层级安排,但是它在中国的国家字典中曾被采用过,现在仍在用。汉字数量惊人,成千上万,至少六到八万,不过常用字只有六到八千,比如,中等规模的汉语文学作品只有两三千的常用字规模;部分中国刑法,在译成英语后,译者发现在用字规模上也只包含不到两千个汉字;据权威考证,《三国志》的十卷中也只有 3342 的用字规模;马礼逊和米怜版的《圣经》中译,共 21 卷,大约为 3600 用字规模。如果每个汉字有且只有一个意思,完全习得汉语的难度就小了许多。很多汉字放在不同地方就表达不同的意思,甚至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新意思。有时两三个汉字是同义词,用起来只是为了意思上的简明,还有的汉字会失去本来的意思,表达一个新的意思。如果我们考虑这么一个事实,就是汉字有不同写法,那么显而易见,汉语是一门深奥的语言,能够准确自如地读、写、说汉语确实需要经年累月的习得过程。

2. 语音方面

在汉语口语中,只有 450 个被认为是单音节字,汉字只有约 2000 种发音,其中的重要部分在于字调和字音的屈折变化。这个话题需要进一步说明方可被充分理解,完全可以另外写一篇论文。很明显的,特别要注意的是,汉语的这种特性使得其习得变得极其困难,并且在表达上也存在缺陷。当汉字的数量如此之少(如果我们专指外国人用来表达汉语所用的音节和符号^[3]),而其中大部分汉字可以仅仅通过声调或者语调来区分。在听汉语口语时,对其理解总是容易出错,那些大量的同音异义字,尽管其意义和形式完全不同,但是用英语字母拼写起来几乎一样,这是学说汉语的极大障碍。要想降低这种困难,可以把两个意思相同但读音不同的汉字结合起来,表达一个意思或者物体。尽管有此权宜之计,汉语仍然是不完美的口语。对于汉语发音学习,外国学习者极为困惑,因为没有大量的经验,所以他们很难把握汉语语音上的细微差别和准确而清晰地发音,来使中国人轻而易举地理解。

3.语法方面

汉语的语法结构非常简单,它不受形式和词源以及数、格、语气、时态等的限制,而是通过在名词和动词上无任何变化的小品词来表示语法意义。即使在许多情况下,西方的语言大师都需要采用这种方法,但是语法上的区别或关系仅仅是由句子或段落的几个部分的位置来表示的,这有时会使一个段落或短语的意思模糊不清。对于汉语母语者而言,他们已经习惯于用这种方法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表达中很少产生困难;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说,除非他在语言知识的运用上已达到了相当熟练的程度,或者能够在调查中得到汉语母语者的帮助,否则他很容易误解作者的意思。

汉语的句法规则是非常特殊的,它与西方的字母语言不同。一个汉字的语义功能可能会从名词变为动词,或变为副词,这通常会使外国人在确定文本的意思时遇到很大困难。正因为汉语缺乏西方语言那些明显的约定俗成的构词规则,一些作家有时把汉语定名为一种句法语言。

4.写作方面

汉语写作,像无韵诗一样不胜枚举,被中国人推崇为汉语之极美。有卓越写作能力的作家都会经历这一阶段,通篇使用对偶,因此他的句子在字数上相互保持一致。以议论文体编撰的书籍通常比那些高层次的文艺书籍少些修饰,例如,政府公告以及那些在科举应试中产生的论文。然而,汉语这种特性或多或少的都会被保留在每一种写作中,并构成其主要特征。显而易见的是,许多人关注中国人表达思想的方式,也考察思想如何被自由地表达,事实上,思想的形成应该是次要的考虑对象,而他们的表达方式才是汉语写作首先需要关注的。还有另一个区分这种语言的标志,这是在其他任何国家都很少见的,汉语中有许多成语,就像我们的法律术语一样,经常会被反复使用并表达相同的意义,这种情况也会在汉语的文本中大量出现。事实上,他们的书中充满了格言警句,这是根据作者的喜好编纂而成的,他们的思想千篇一律,在那些从古代圣贤流传下来的记载当中,包含了中国人希望珍惜或极力主张的所有思想。因此,汉语写作的卓越之处,就在于重新整理那些只有在古代典籍里才可以找到的规范短语,这是汉语各类文学作品的普遍现象,甚至连为自由而喜悦、为创造而荣耀的诗歌也都会受到这种严格规则的束缚。诗人或任何类型的作家,敢于偏离古代既定的常规价值的人会被视为异端,并且会被指责成不孝和叛逆的人。

(二)汉语语言系统的优点

现在我们已经注意到了汉语的主要缺陷,也应该同样看到其突出的优点。虽然听起来汉语没有大多数印度支那语言那样圆润低沉,但当你仔细观察它的句段和语调时,你会发现它很悦耳。有时由于一个句子中汉字的选择和位置,会导致语言风格中一定程度的力与美无法在翻译中得到体现。不过在表达上很少有其他任何类型的语言能够达到像汉语一样精炼简洁。

或许我们不应该期望从某一个人的著作中找到与最杰出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或现代欧洲学者同样美丽的风格,但是中国人对自己要求精益求精,一个观点的提出只有经过公正的判断,才能被大众所接受。汉语书籍富于精妙的表达,有精彩的插图、奇妙的比喻和大胆的隐喻。

这种类型的文献五花八门,它在某些方面的介绍非常丰富。古希腊和古罗马鲜有作家像中国作家一样创作了大量且广泛的作品。在孔子时代,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种类上都出现了许多作家。但是,在中国现在这个堕落的时代,新作品十分罕见,而那些被指责是浅显而琐碎的作品,大概又很难发挥指导或真正娱乐大众的作用。中国人需要一种新的文学,这种文学要富于思想,能正确地表达感情,并且在风格上清新优雅,还要模仿他们的语言风格,对于习惯了这种语言形式的中国人而言,这种新的思想和感情要想引起读者的兴趣,并且对他们有益,这真的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其中,对中国人的权威著作进行大量的研究和深入的了解将是十分必要的,因此,使外国人以这样一种风格来写作才能取悦中国人并使他们自己受益。

应该牢记的是,在外国人能够控制中国人的社会品位和思想情感之前,他们必须能够使用这种

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样做不仅清楚且易于理解,而且能够为他们赢得中国人的耐心和细心的倾听。看起来这确实非常困难,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以及他们对外国人充满蔑视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心,外国许多文献不符合他们的语言习惯,不会吸引多少读者,但是,如果我们有新颖有趣的想法、纯洁高尚的情操,所有神圣启示的崇高真理都得以在中国本土服饰中有所展现,那么我们可能就会获得一种唤醒心灵、挥洒激情、纠正判断的魅力和力量,并将最终演变成为一种影响整个中华帝国的精神和道德革命。引导中国人读外国文学作品需要他们极大的兴趣,并且需要很大的关怀来应对其对国外新式论文的不适应。汉语是如此的不同,因此,除了神学经文外,直接翻译是不推荐的,但是汉语富于字词变化,能向人们传递大量的思想以及有关其历史事实的描述。

三、欧美人对汉语研究的历史

上面那些考虑是基于长期观察得出的,这使得我们需要重视汉语,否则将难以破除中国和中华民族闭关锁国的壁垒。要全面融入这个国家,汉语就是最好的途径。

当然,对于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熟练掌握汉语,更能了解有关中国和欧洲的大量历史,只有我们把汉语当作交流的工具,才有互利的交往,才会有知识的相互传播,汉语才体现其真正的重要性。

中国人不仅仅在精神层面比以前低了,他们的艺术与科学也出现了退步,与千年前相比,其经济活力也在降低。更奇怪的是,中国政府的政策,不仅不鼓励创新人才,而且刻意打压偶尔冒出的一些人才。并非我们刻意贬低,我们认为正是政府扭曲的政策导致了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异。曾几何时,中国的国际贸易比今时繁荣很多,本可以持续繁荣到今天,比如中国的制造业曾经世界顶尖,现在已经落后于西方,我们在工业革命后已经步入蒸汽时代。其他各个方面都是如此,东方的人们还没有苏醒,需要让文学进入新时代来唤醒他们的思想,结束政府的暴政,去除皇权的奴性,争取国权和人权。

说实在的,除非中国接受西方的影响,否则我看不到中国有回到曾经大国地位的可能。要抵制外国的入侵,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西方影响来摆脱束缚呢?是如同欧洲摆脱黑暗的中世纪那样?欧洲中世纪和现在中国有相似之处:皇帝和教皇,成群的教徒和大批的官僚。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其真实处境,也不关注其他国家有价值的东西,更不能准确对自身进行定位,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无从改进。康熙大帝,算是历史上最英明开放的皇帝,在朝廷上从洋人那学了很多知识了,但也不及任何一个自由游历的欧洲人^[4]。只有放开自由的交流,才能获得提高,但是中国君主都忙于一点:皇权。皇权的维持和交替与教皇不同,因此中西方的发展轨迹不同,并且中国的专制更加残酷。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很多地方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权威力量,这些人掌握话语权,对朝廷上下有很大影响力,对语言文字极其精通,却不愿意传播实用知识。他们依靠盛大仪式来吸引群众注意,却并不触及和思考神圣的真理。一旦发生事变,他们就会被赶下权力的舞台,成为丧家之犬,他们对于国家的架构也就轰然倒塌,归于尘土。对于耶稣会传教士而言,就连接近这个国家也变得举步维艰。

然而,对于中国而言,一个危机迅速来临,一场变革,虽然会被压制许久,终将会以军事或暴力的方式不可避免地爆发。我们知道,军事力量不会让社会状况改善,但是这招险棋可以撬开进步的大门;另一方面,知识的传播,可以影响道德和宗教,净化权力的源泉,检验暴乱的正义性,阻止非法用刑,可以拯救中国于危亡,使中国重新屹立于民族之林。这种知识传播必须要由外国势力介入,并且代价不能太大,一个军事行动可能会造成几千人死亡,大量财产损失,但是知识的入侵,真理的胜利不需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却成果丰硕,能给中国民众带来和平和希望。只是目前这项工作毫

无进展,不免令人心灰意冷,在基督徒的世界里,也没有多少人去关注汉语研究。

如果我们注意到已经取得的一些成果,我们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一领域的巨大需求,以及一些准备推动汉语研究而伸出的援助之手。这方面法国人占得先机,早期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大都是来自法国,其中有几个人,得到了路易十四的授权支持,成为中国文学在欧洲的奠基人,并在汉语研究方面独树一帜。汉语中一些词语的翻译和礼仪纠纷,引发了耶稣会与多明我会之间的争议,并使得一批有水平的人物参与其中,如白晋(Joachim Bouvent, 1656-1730)、张诚、柏应理、宋君荣(Antoine Gaubil, 1689-1759)和马若瑟等等。路易十四的继任者依旧大力支持汉语研究,尽管做了这些,但是因为两国之间的交往中断,公众反对研究汉语,汉语和中国文学作品的研究很快就在法国被遗忘了。1815年,汉学家雷慕沙(Abel Rémusat, 1788-1832)在巴黎大学任皇家学者,其他的学者追随其脚步,作为其继任者,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也被任命为皇家学者。1815年的巴黎的图书馆已经藏有5000卷中国图书,自此以后一直在增加。

西班牙,尽管其在卢卡尼亚^[5]的殖民地使其对汉语有所耳闻,但是却并没有对汉语和中国文学做过研究,如今西班牙对汉语研究虽有所参与,不过心不在焉。由于占据澳门的原因,葡萄牙人比西班牙人下了较多的功夫,从三百年前葡萄牙人接触中国开始,他们对汉语的学习就有很大的优势,但对于汉语的学习仅仅局限于居住在澳门的外国人,江沙维(Joaquim Afonso Gonsalves, 1781~1841)在圣约瑟书院的研究值得肯定。荷兰人虽然曾经占领过中国台湾,但是荷兰人却没有去学习汉语。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俄罗斯一直享有学习汉语的地利之便,但是他们并无所成,既没有给自身也没有给世界带来什么改变。远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学校也难以促进欧洲人学习汉语的热情,那儿学习汉语的学生与世隔绝,就知道学习天主教的教条。在德国柏林以及欧洲大陆的一些地方也都建有中国图书馆,但鲜有从事汉语研究的人。

考虑到英国民众的进取心、朴实的性格,还有那广泛的、由来已久的与中国的交往,很难想象英国无视汉民族的语言这么久。据我们所知,在设立麦卡尼大使馆之前,可以说英国没有任何人对汉语有所了解。这个民族并没有充分去考虑研究这门语言,那个大使馆的义务就是在海外寻找这种帮助,对于在向清廷传教的过程中保持交流,这种援助十分必要。小斯当东是这个大使馆里唯一能够熟练使用汉语的欧洲人,他花了几年的时间,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自学汉语。在那样的情况下,乾隆皇帝接见大使(即马嘎尔尼)的时候,他发觉了由于各方语言不通所造成的巨大交流不便,于是,在1810年,中国的刑法典的译本便在伦敦出现。那时,以翻译《圣经》为主的两名传教士——马礼逊在中国,马士曼在孟加拉,从事汉语研究很成功。英国有两三个中国图书馆,但是都是闲置的,而马六甲的英华书院图书馆有选择性地收集了许多汉语书籍。

对美国的沉默,或许我们不应该置之不理。在半个世纪前,美国和中国已经建立了初步的商业联系。应该说,要不是美国公民做到了这一点,抑或如果没有美国庇护的话,在其辖区范围内我们恐怕连个国旗都没办法竖立起来。我们既不会看到中美利益的冲突,也不会看到美国带着贡品献给中国皇帝,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在开拓一个更加自由、更加体面、更加有序的中美外交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在向国外派遣公使和领事的时候,这些人很有必要,当然也通常会学习被派驻国的语言。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存在一个疑问,那就是,这种具备先决语言条件的人不能被中国人完全接纳。目前,据我们所知,美国还没有一个人深入而广泛地学习过汉语,更没有人对汉语进行过研究。在美国也可以找到一些中文书,同时,毫无疑问,词典编纂者和语言学家也已经了解到了欧洲学者出版的一些语法书和词典。现在,美国东部有一些学者已经在从事汉语的研究工作,但是他们在最后时刻才展开有关研究工作,其成功与否尚有待时间考验。

在这里,我们不应该漠视那些准备已久才出版的有助于汉语研究的文献,其中主要语法的列表和词典才是我们应该去关注的。这些文献的数量并不是很多,并且,其中已经问世的还存在不少缺

点,这主要是由学习汉语的特殊困难造成的。然而,这一方面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我们已经做了足够的工作来鼓励这个领域内的学者持之以恒,并鼓励那些可靠的人选进入该领域。有趣的是,我们有了一些发现,起先是一本汉语语法书,1703年在广州用西班牙文印刷而成,作者是弗朗西斯科·瓦罗(Francisco Varo, 1627-1687),这本书用中国的纸木刻印刷而成,并被放置于木匣子里,书中没有任何汉字;巴耶尔(Gottlieb Siegfried Bayer 1694-1738)的《中国杂纂》出现在1730年,布瑞特科夫的《探索典型汉学——手写汉字和八股文》于1789年出版;德金(Chrétien Louis Joseph de Guignes, 1759-1834)奉拿破仑之命,编纂的《汉法拉丁字典》^[6],在1813年问世于巴黎;1814年,马士曼的《中国言法》在印度的赛兰坡出版;第二年,马礼逊的《通用汉言之法》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马礼逊的《华英词典》也分成六卷,在1815年到1822年间,由著名的东印度公司设立在澳门的印刷所出版;雷慕沙的《汉文启蒙》也于1822年在巴黎出版;1831年,马若瑟的《汉语札记》由马六甲英华书院出版。江沙维(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编纂的《汉葡字典》也于1833年在澳门印刷出版。还有两部新的作品即将出版,一本是由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编写的《福建方言字典》^[7],将由澳门的出版社印刷,另一本是郭实猎编纂的英汉词典^[8],将由赛兰坡的出版社出版。

四、西方人学习汉语的必要性

现今,研究汉语的诱因很多,诸如既不能忽略汉语已经为人熟知的事实,也不能不去想办法吸引明眼人的注意力。即便我们现在双手交叉在胸前,回顾整个世界只有一种语言的时代,并且为那些引起上帝不满、使上帝迷惑、混淆他们的语言,并将其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愚蠢之人而悲叹,这些都是徒劳的。在与其他种族长期分离的状态下,我们种族的各个部分都处于困惑和沮丧之中,好像这个民族的血脉相延袭的不够纯种,他们有的似魔鬼,有的似人,彼此互相攻击,而那些强大的种族却往往在人类的杀戮史上留名。不过,上帝本来是要给全人类创造一条血脉的,他的目的肯定是要让人类布满全球,让和平充满世界,中国也毫无疑问将成为诸多民族中的一员,和他们相互合作,相互同情,并且一起行动。要促成如此之大的改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这就需要全体基督徒付诸于实践。由此产生的好处是巨大的,研究汉民族语言的诱因也会变得越来越大。不论我们是从商业、政治、文学还是宗教的角度来看待这个课题,我们都认为,没有哪一种外国语言能像汉语这样让西方世界的人们如此牵肠挂肚,绞尽脑汁。

每一个熟悉中国的人都知道这个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商业关系是建立在一种非常不好的基础之上。我们不否认这种尴尬状态下进行的贸易是有利可图的,但它可能会产生更大的效益。让整个欧洲受制于一个人,并且所有的对外贸易仅限于加迪斯,然后西方人民才能够判断中国的政策。贸易不仅局限于国家最南端的一个港口城市^[9],而且主要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并受不透明的法律所约束,难以计数的小麻烦和暴露的非法税收将使我们不堪重负。现在为了消除这些邪恶势力,并在一个永久性和安全性并存的良好基础上建立一个最重要的商业分支,我们必须要有机会接近地方政权。除了俄罗斯,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中国建立如此稳定的关系,但是出于什么原因让他们与中国处于如此遥远的距离?为什么欧洲和美国的船只不可以造访中国水域、沿海岸航行和驶入这个大帝国的港口和河道?这片水域不是连通许多国家的要道吗?在什么原则上,或是出于什么原因,当他们接近这些海岸的时候,除了在指定点上的船只,其他的船只能马上离开?这意味着迄今所采用的与这片土地的君主谈判的方法彻底失败了,而现在必须求助于他人。他们将是些什么人?他们没有剑,没有刺刀,也没有舰队,只有采取这种手段他们才能够完全了解对方的愿望和目的。例如,有些证据,包括人和书籍,这些书籍是阿美士德勋爵在访问厦门、福州、宁波和

上海期间完成的。我们要让出版物来说话,这样中国人就能理解外国人的性格、愿望、权利、目的以及优点,然后他们就会屈尊俯就,甚至还会乐于谈判。

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商业和政治关系,要依赖于外国人的汉语语言知识,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这就诱使外国人产生了学习汉语和研究中国文学和法律的强烈动机,还有其他重要因素促使我们了解中国语言,以便我们可以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道德和宗教系统。在整个欧洲或美国颁布并执行法令,或同时在这两地执行,拆除每座上帝的圣殿,销毁每个圣经的副本,我们神圣的宗教条例将被宣告无效并被忘记;让迷信、偶像崇拜与所有物种相伴,让百姓和统治者对木头和石头顶礼膜拜,那么基督教的土地将变得像无宗教信仰的中国,英国、苏格兰、法国、德国和美国将被笼罩在比他们 1500 年前更浓重的黑暗当中。

如何让中国这片如今如此膜拜天堂的土地进入开明和睿智的状态?现在需要通过什么手段才能使他们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发展前进?毫无疑问,其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文字已经形成了重要的媒介,科学和神圣的真理将通过文字照耀着那些国家,在这里必须采取同样的手段。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语言知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它的周围将聚集所有对它感兴趣的人,而这恰恰是无法用笔来描述的。

(附注:该文刊载于《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 1834 年第 1 期,原题为“the Chinese Language”,本文的题目与文中的小标题均为译者所加。)

注释:

- [1] 译注:8 世纪中叶,在对外扩张中,阿拉伯每征服一地,即忙于建清真寺,传播伊斯兰教,阿拉伯语也随之在被征服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于 9~10 世纪在沙姆与伊拉克地区、10 世纪在埃及、12~13 世纪在马格里布成为阿拉伯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及日常生活用语。
- [2] 译注:即反切法,是古人在“直音”、“读若”之后创制的一种注音方法,又称“反”、“切”、“翻”、“反语”等。反切的基本规则是用两个汉字相拼给一个字注音,其中上字取声母,下字取韵母和声调。此处对反切法之渊源取的是佛教来源说,受梵文的拼音学理启发,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其声明学为汉语引入了反切这种注音方法。关于反切渊源,尚有中土说,据北齐颜之推所论,其《颜氏家训·音辞篇》云:“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
- [3] 译注:即拼音,此文章写作时 1832 年我国尚无统一的拼音。
- [4] 译注:科学不仅作为康熙皇帝的业余爱好,而且也成为他政治生命的重要部分,在权力的运作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康熙勤奋学习西学,事必躬亲,不仅因为他的确有此爱好,更是因为他试图藉欧洲新知来达到控制汉人和洋人之目的。参见韩琦:《科学、知识与权力——日影观测与康熙在历法改革中的作用》,《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 年第 1 期。与此形成辅证的是,根据洋人教师张诚(1654—1707)的日记所载,康熙皇帝“告诫我们不要在我们所去的衙门里翻译任何关于我们的科学的东西,而只在我们自己家里去做”;白晋在《康熙皇帝》中评价说:“把热爱科学的强烈感情与专心致志的研究实践结合起来,对于一个中华帝国的皇帝来说,与其受到赞扬,不如说应该受到责备”,“康熙和彼得大帝是没法比的,他没有建立科研机构,没有派人出国考察,不鼓励臣民科学探索”;英国使节斯当东也说:“据说中国有几位君主从外国传教士方面学习外国丰富的数学知识,但中国的政策不使这门学问普及到群众中去。他们怕算学知识普及后,本国人能算出日蚀、月蚀,能制出历本来,皇帝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就要降低了”。
- [5] 译注:卢卡尼亚又名巴斯利卡塔,位于意大利南部。我们查阅资料,并未找到关于有关其殖民地情况的详细记载。也有人认为,此处的原文是 Luconia,可能是 Luconia Breakers 的缩略写法,即中国的南海琼台礁,参见张微《裨治文的汉语认识初探》一文的注释,载张西平、柳若梅编《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第 71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经查,琼台礁在北纬 4 度 59 分,东经 112 度 37 分,位于潭门礁西南约 3 海里,距离中国最南端的曾母暗沙 117 公里,据《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2010 年 10 月的实地考察,琼台礁已经发育成为一个出露水面的小岛,长约 60 米,宽约 20 多米,围绕着它的是一圈环礁。这样看来,张微所言西班牙占据琼台礁为殖民地之说

的信度则大为降低。

- [6] 译注:该文发表时并不知晓欧洲汉学史上的词典之争,这也是汉学史上的一桩公案。根据目前所见文献记载和学界的研究,入华天主教传教士编写的汉外词典的巅峰之作,当属方济各会传教士叶尊孝(Basilio Brollo 1648-1704)的《汉字西译》。叶尊孝发现,如果词典使用者不懂得葡萄牙文或西班牙文,就无法使用利玛窦、万济国等前辈编写的汉外词典,因此他使用了当时欧洲的通用语拉丁文编写汉语词典。叶尊孝的《汉字西译》共有两部分组成:一是按部首检索的汉拉词典(1694),二是按注音检索的汉拉词典(约1698-1700)。叶尊孝的《汉字西译》中有中西合璧的汉字部首检索和汉字注音检索体系,成功地解决了汉外词典中汉字词目的检索难题。此外,这两部汉拉词典在收词规模、编排设计、释义和例证等方面都有很大突破。自18世纪20年代起,罗马教廷曾计划出版叶尊孝的词典,但始终未能如愿。德金奉命编辑的词典在巴黎出版,成为欧洲本土自16世纪以来出版的最实用的一部汉语词典。然而,这部词典的出版也将德金卷入了一场激烈的词典之争。根据词典内容,也许德金在拿破仑的高压下确有难言之隐,但必须说,德金无疑是高度借鉴了叶尊孝的词典,言其抄袭恐怕并不过分,他最为人诟病之处也就在于没有给予叶尊孝应有的地位,所以至今欧洲一些著名的汉学书目中仍将这部词典归在叶尊孝名下。上述的汉外双语词典都是手稿形式,是汉外词典史上具有起源性质的、处于发展变化过程中的重要文本。参见杨慧玲:《汉英双语词典的诞生及其早期设计特征》,《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5期。
- [7] 译注:此处所言的词典名称或许仅仅是作者的道听途说,麦都思的词典确实计划在澳门印刷所出版,惜因故没有印完,根据文献所载,是指后来出版的《福建方言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Hok-keñ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37),该字典是继马礼逊《广东省土话字汇》之后的另一部方言字典,也是最早的福建方言字典。1823年,麦都思完成编写后曾送到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等地谋求刊印,但均未获成功。1829年,东印度公司表示同意资助这本字典的出版,于是麦都思又作了大量的增补。印刷工作于1831年开始,但1834年4月由于东印度公司特许经营权的解除而使这一工作被迫中断。1835年12月,麦都思来到广州、澳门寻求印刷资助,得到美国商人奥立芬的帮助,才由卫三畏将其印出,全部印刷工作终于在1837年完成。麦都思后来还完成《英汉词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Shanghai, The Mission Press, 1847-1848),是由上海的墨海书馆出版。
- [8] 译注:查阅有关文献,郭实猎著述关于中国近代的著作有《中国简史》(1834年)、《1831、1832、1833年三次沿中国海岸航行日记,附暹罗、朝鲜、琉球介绍》(1834年)、《道光皇帝传》(1852年)、《开放的中国——中华帝国概述》(两卷本,1838年)等,未见该词典的有关情况。
- [9] 译注:加迪斯港,位于西班牙南海岸,是16世纪西班牙最重要的军港和商港。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of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ed by WEN Yuxuan & XIA Changhong

(Overseas Education colleg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102 China)